

周祖謨  
校箋

方言校箋

(附索引)

中華書局

# 方言校箋

(附索引)

周祖謨 校箋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方言校箋:附索引/周祖謨校箋.一北京:中華書局,  
1993.2(2004.11重印)

ISBN 7-101-01009-1

I. 方… II. 周… III. 漢語方言 - 古方言 - 方言研  
究 IV. H1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11906 號

方言校箋  
附索引  
周祖謨校箋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idu.com.cn

E-mail:zhidu@zhidu.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16<sup>3</sup>/4 印張 · 1 插頁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1501 - 3500 冊 定價:38.00 元

ISBN 7-101-01009-1/H · 88

## 重印說明

《方言》舊本前後錯亂、訛字衍文、脫落倒置等錯誤甚多，周祖謨先生以南宋李孟傳刻本為底本，校以各種傳刻本，全面吸收了清代學者戴震、盧文弨、王念孫等人的校勘成果，同時參校了多種宋代以前的古書，寫出了詳盡的校記，從而整理出這個比較清晰可靠的《方言》校本。

本書初版於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六年由科學出版社再次印刷，並與吳曉鈴先生主編的《方言校箋通檢》合訂為一冊，一九九三年中華書局據初印本影印，遵照作者的一致意見，不再與《通檢》合訂，書後附一新編製的四角號碼索引和筆畫索引。此次即據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本重印。

特此說明。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四年十月

## 羅序

在語言學的三大部門裡，從中國古代語言學發展史來看，詞彙學創始的最早，可是後來並沒能發揮光大。音韻學到第三世紀纔有了萌芽，因為受了幾次外來的影響，比較最能走上科學的路。文法學發展的最晚，一直到第十九世紀末纔有了第一部系統的文法書，馬氏文通（前六卷一八九八年冬出版，後四卷一八九九年付印）。它以後的五十年來，還不免停滯在‘拉丁文法漢證’或‘拉丁文法今證’的階段。

詞彙的纂輯從公元前二世紀已經開始了。爾雅的著者雖然有人偽託得很古，實際上它只是漢代經師解釋六經訓詁的彙集。曹魏時張揖所作的廣雅，也仿照爾雅體例，搜羅爾雅所沒有收進去的名物訓詁。這一類的詞書是專為六經作註脚的，他們所輯錄的限於古書裏有文字記載的語言，並沒有注意到當時各地人民口裏的活語言。至於較後的劉熙釋名，乃是一部主觀的、唯心的訓詁理論書，近人雖然有根據它作‘義類’或‘字族’研究的，可是從唯物的語言學觀點來看，這部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並不佔重要的地位。當公元第一世紀左右，已經有唯物的觀點，從大衆的語言出發，應用客觀的調查方法的，只有方言能夠具備這些條件。

方言是中國的第一部比較方言詞彙。它的著者是不是楊雄，洪邁和戴震有正相反的說法，後來盧文弨、錢繹、王先謙都贊成戴說，認為方言是楊雄所作。本書的著者周燕孫（祖謨）在自序裏對這個問題並沒加斷定，他的矜慎態度是很可嘉許的。我自己却很相信應劭的話：他在風俗通序裏開始說：“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

## 羅序

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由這段記載，咱們可以推斷：方言並不是一個人作的，它是從周秦到西漢末年民間語言的可靠的記錄。楊雄以前，莊遵（就是嚴君平）和林問翁孺或者保存了一部分資料，或者擬定了整理的提綱。到了楊雄本身也願意繼承前人的旨趣，加以‘注續’。他‘注續’的資料不是憑空杜撰的，而是從羣衆中來的，他雖然沒有坐着輕便的輶軒車到各處去調查方言殊語，可是他利用各方人民集中都市的方便，記錄了當時知識份子（孝廉）、兵士（衛卒）、其他平民乃至少數民族的語言。他所用的調查方言法是“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藁。”（答劉歆書，並參閱西京雜記）。這簡直是現代語言工作者在田野調查時記錄卡片和立刻排比整理的功夫。這真是中國語言史上一部‘懸日月不刊’的奇書，因為它是開始以人民口裏的活語言作對象而不以有文字記載的語言作對象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方言裏所用的文字有好些只有標音的作用：有時沿用古人已造的字，例如，“儻、慧也”，說文“慧、儻也”，荀子非相篇“鄉曲之儻子”；有時遷就音近假借的字，例如，“黨、知也”，‘黨’就是現在的‘懂’字；又“寇、劍、弩、大也”，這三個字都沒有‘大’的意思；另外還有楊雄自己造的字，例如‘惁’訓愛，‘儻’訓哀，‘蚌’訓好之類。這三類中，除了第一類還跟意義有關係外，實際上都是標音符號。至於像‘無寫’、‘人兮’一類語詞的記載，更是純粹以文字當作音符來用的。假如當時楊雄有現代的記音工具，那麼，後代更容易了解他重視活語言的深意了。方言還有一個長處，就是郭璞方言注序所說的：“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它雖然偏重橫

## 羅序

的空間，却沒忽略了縱的時間，雖然羅列了許多殊域方言，却能劃分地區，辨別‘通語’、‘凡語’和‘轉語’；在頭緒繁縝的資料中却能即異求同，條分縷析。綜括全書來看，這的確是一部有系統、有計劃的好書。它的許多特徵，本書的自序已然說得很詳細，這裏就無須贅述了。

楊雄以後，懂得這部書是拿語言作對象的，前有郭璞(二七六至三二四)，後有王國維（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跟他所用的調查方法不謀而合的，只有一個劉獻廷（一六四八至一六九五）。從景純的注可以看出漢晉方言的異同，和有音無字各詞的讀法；可是假若沒有靜安的闡發，郭注的優點恐怕也不能像現在這樣顯著。所以郭王兩君都可以算是方言的功臣。劉獻廷曾經想應用他自己所定的新韻譜（一六九二）“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便可印證。以此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廣陽雜記卷三)。拿他所說的跟楊雄比較起來，雖然劉偏重音韻，楊偏重詞彙，但是在十九世紀以前，語言學還沒成爲科學的當兒，中國的先民居然前後輝映發明了跟現代語言科學若合符節的調查方法，這實在不能不算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兩大貢獻。

楊雄以後，續補方言的有杭世駿、戴震、程際盛、徐乃昌、程先甲、張慎儀各家。至於分地爲書的，有李實蜀語、張慎儀蜀方言、胡文英吳下方言考、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毛奇齡越語肯綮錄、茹敦和越言釋、范寅越諺、劉家謀操風瑣錄、胡樸安涇縣方言、詹憲慈廣州語本字、羅翹雲客方言等；考證方言俗語的，也有岳元聲方言據、楊慎俗言、錢大昕恆言錄、錢坫異語、翟灝通俗編、張慎儀方言別錄、孫錦標通俗常言疏證、謝璿方言字考等書。綜起來看，這些書大都

## 羅序

是從史傳、諸子、雜纂、類書、以及古佚殘編等抄撮而成，除去一兩種外，始終在‘文字’裏兜圈子，很少曉得從‘語言’出發。能夠了解並應用方言本書的條例、系統、觀點方法的，簡直可以說沒有人。可惜在中國語言史上發達最早的詞彙學，從方言以後，就這樣黯淡無光，不能使第一世紀左右已經有了的逼近語言科學的方法繼續發展！

章炳麟的新方言，運用古今音轉的定律來整理當時的活語言，比起上面兩類著作來，算是知道拿語言作對象的。不過，他一定要把‘筆札常文所不能悉’的語詞，都在爾雅說文裏求得本字，硬要證明‘今之殊言不違姬漢’，那就未免拘泥固執沒有發展觀念了！關於這一點，倒是他的弟子沈兼士見解高明的多。沈氏說：“表示語言的文字，本不一定都用本字”；語詞隨時孳生，“後起的語言，不必古書中都有本字”。“語言往往因種族交通而發生混雜的狀態，倘一切以漢字當之，恐反昧其來源”。並且“中國的語言由單綴音逐漸變為多綴音，而文字學家仍拘守著‘字’，不注意到‘詞’，對於複音詞往往喜歡把他拆開來，一個一個替他找本字，殊為無謂”。這些議論的確是‘青出於藍’的。沈氏認為研究方言的方法可以分縱橫兩方面：縱的方面應該從事“各代記載中方言之調查和比較”，“單綴語漸變為多綴語之歷史的研究”，“語言與文字之分合的研究”，“語源的研究”；橫的方面應該從事“語彙之調查”，“同一意義之各地方言的比較研究”，“各地單語之詞性變化法的比較研究”，“與異族語之關係的研究”。（見段硯齋雜文‘今後研究方言的新趨勢’）。這些觀點直到現在還是很重要的。章沈所論雖然跟方言本書沒有直接關係，實際上却比那些續補方言或考證常言俗語的著作有價值，所以我在這裏附帶提一下。

## 羅序

周君這個校本以宋李文授本作底本，而參證清代戴震、盧文弨、劉台拱、王念孫、錢繹各本，論其是非，加以刊定。旁徵的論著達三十三種，其中的原本玉篇殘卷、玉燭寶典、慧琳一切經音義、倭名類聚鈔、王仁煦切韻、唐韻殘卷等都是清人所沒看見的。對於原書的譌文脫字也都能够依例訂正：實在不愧是‘後出轉精’的‘定本’。至於吳曉鈴君主編的通檢兼用‘引得’和‘堪靠燈’兩法，分析細微而且富於統計性，對於應用方言作研究的人實在便利萬分，減少無窮的麻煩。拿通檢跟校箋配合起來，可稱‘相得益彰’！從此中外學者再來研究方言，祇要‘手此一編’，就可以不必還在校刊文字和分析排比上費冤枉功夫；他們就可以集中精力，‘單刀直入’地從語言的觀點去探討方言的精詣。這樣一來，二千年前莊遵、林閭翁孺、和楊雄的集體工作，才可以在郭璞、劉獻廷、王國維之外，多加幾個知己。假如將來中外學者對於方言能够有偉大的新貢獻，那麼，他們的成績應該有不少的部分記在周吳兩君的賬上！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羅常培序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 自序

方言是中國很早記載古代語言的書，漢末晉初的人都說是楊雄所作。如應劭的風俗通義<sup>1</sup>和常璩的華陽國志<sup>2</sup>都是如此。但是漢書藝文志<sup>3</sup>和楊雄傳<sup>4</sup>根本沒有說到楊雄作方言，所以宋朝的人便懷疑起來，以為屬之楊雄，可能出於依託。關於這一個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up>5</sup>分辨的很清楚，結論是：‘反覆推求，其真僞皆無顯據’。但是我們知道這部書題名叫做‘方言’，並且普遍的流傳起來，應當是東漢和帝以後的事。

首先我們看王充論衡<sup>6</sup>裡面稱讚楊雄的文章和太玄法言兩部書的地方很多，可是始終沒有提到方言。例如齊世篇<sup>7</sup>說：‘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這一段話和方言後面楊雄答劉歆書中所說：‘張伯松嘗爲雄道，言

1. 見應劭風俗通義序頁3，(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本，下同)。
2. 見常璩華陽國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讚”，葉2b-3b (四部叢刊初編本)。
3. 見漢書卷三十，志十，葉1a-36b (百衲本二十四史本，下同)。
4. 見漢書卷八十七上，列傳五十七上，葉1a-24a；卷八十七下，列傳五十七下，葉1a-17b。
5.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經部小學類，“方言”條，葉2a-3a (大東書局石印本)。
6. 見論衡卷十三，超奇第三十九，葉14b-20b；卷十八，齊世第五十六，葉16a-22a；卷二十，佚文第六十一，葉6a-11a；卷二十八，書解第八十二，葉9b-15a；卷二十九，案書第八十三，葉1a-6a；卷二十九，對作第八十四，葉6a-11a (四部叢刊初編本)。
7. 見論衡卷十八，齊世第五十六，葉20b。

## 自序

其父及其先君惠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堦之與牛場也……’很相符合。但是王充沒有一字說到方言。王充是在和帝永元年間（A.D.89-104）死的。其次我們看許慎的說文解字裡用方言解釋字義的和今本方言詞句相同的很多，他既沒有說到楊雄作方言，也沒有說到方言的書名。許慎的書是和帝永元十二年（A.D.100）開始作的，建光元年（A.D.121）才完成。從這兩點來看，和帝的時候還沒有叫做方言的一部完全的書是很清楚的事情。直到靈帝獻帝的時候，應劭在漢書集解<sup>8</sup>裏開始明白引用方言，而且稱爲‘楊雄方言’；他又在風俗通義序<sup>9</sup>裏更詳細地引用楊雄答劉歆書的話，而且說方言‘凡九千字’。由此推測，方言在漢末應當已經普遍流傳起來了。魏孫炎注爾雅是引用方言的，張揖作廣雅也把方言的語詞大量搜羅在內，這都是很好的證明。

那麼，方言會不會是漢末人作的呢？這又不然。因爲許慎說文裏既然有很多跟今本方言相合的詞句，必然在和帝永元以前就有了跟今本方言相類的記載了。從永元十二年（A.D.100）推到楊雄的卒年，就是天鳳五年（A.D.18），中間是八十二年。如果方言不是楊雄所作，在這八十年裏也就有了最初的底本。從許慎完成說文的時候，就是建光元年（A.D.121），到應劭作風俗通義的時候，約在獻帝興平初（A.D.194），中間是七十三年。這七十三年中應當是有了‘方言’的名稱，而且逐漸流布的時期。這麼說，方言是不是楊雄所作，很不容易斷定。不過，這部書包括了西漢東漢之間許多方言的材料倒是很值得寶貴的。

8. 見戴氏遺書卷五，葉17a，方言疏證序（徵波榭刊本）。

9. 見風俗通義序頁3-4。

## 自序

這部書記載的都是古代不同方域的語彙，地域包括的很廣。稱名雖然很雜，而都是漢代習用的名稱。有的是秦以前的國名和地名，有的是漢代實際的地名。東起東齊海岱，西至秦隴涼州，北起燕趙，南至沅湘九疑。東北至北燕朝鮮，西北至秦晉北鄙，東南至吳越東甌，西南至梁益蜀漢。作者能够搜集這麼多的方言，必然是在漢代武功極盛之後，版圖已經開拓很廣的時候做成的，否則不能如此<sup>10</sup>。但是要記載這樣廣大地域的語言，採用小的地理的名稱是很困難的，所以不得不採用古代的國名和較大的地名。

作者記載方言的方式，是先舉出一些語詞來，然後說明‘某地謂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間謂之某’。這些方言的語詞都是作者問到以後記下來的。魏天行先生曾經給它一個名子，叫做‘標題羅話法’<sup>11</sup>。其中所記的語言，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一般流行的普通語。凡說‘某地語’、或‘某地某地之間語’的，都是各別的方言。說‘某地某地之間通語’的，是通行區域較廣的方言。說‘通語’、‘凡語’、‘凡通語’、‘通名’、或‘四方之通語’的，都是普通話。凡說‘古今語’或‘古雅之別語’的，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言。若從所記的方域來看，凡是一個地方單舉的，它必然是一個單獨的方言區域；某地和某地常常在一起並舉的，它們應當是一個籠統的區域。這樣也可以極粗疏的看出來漢代方言區域分布的大概情形<sup>12</sup>。

10. 例如書中所稱涼益二州就是漢武帝元封以後才有的名稱，涼州舊稱雍州，益州舊稱梁州，見漢書卷二十八·志八上，集10b。

11. 見魏建功方音研究講義頁21（北京大學排印本）。

12. 見林語堂語言學論叢頁6-44前漢方音區域考（開明書店排印本）。

## 自序

單就這種實際的語言記載裏我們還可以知道：

(1) 一部分漢代社會文化的情形。例如由卷三‘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一條，知道蓄養奴隸在漢代是很普遍的事情；由卷四所記衣履一類的語彙，可以知道漢人衣著的形製；由卷五所記蠶薄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稱，可以知道養蠶在南北是很普遍的事。

(2) 爾雅所記的許多同義詞和方言對照來看，往往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語，到了漢代有些還在某一地方保存着，有些已經變成了普通語。甚至於有些已經消失，僅僅是書寫上的語詞了。

(3) 方言所記漢代的語言有普通語和特殊語。我們知道：不同的方言相互交融，可以成為普通語；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語言，也可以成為普通語。漢代的普通語應當是由這兩方面形成的。我們想春秋以前民族是多的，語言是分歧的，可是經過列國的爭霸，七雄的角逐，秦代的統一，各地的語言彼此吸收，其間不知有了多少次的糅合。後來到了漢代，原來不是通語的，也就變為通語了。再看方言所記的語言，其中以秦晉語為最多，而且在語義的說明上也最細。有些甚至於用秦晉語作中心來講四方的方語；由此可以反映出來秦晉語在漢代的政治文化上所有的地位了。進一步來說，漢代的普通語恐怕是以秦晉語為主的。因為一個新興的統治者對於過去在政治文化上有力量的語言是往往承接過來的。春秋時代的‘雅言’就是統治階級一般所說的官話，這種官話就是‘夏言’<sup>13</sup>，‘夏言’應當是以晉語為主的。因為晉國立國在夏的舊邑，而且是一時的霸主；晉語在政治和文化上自然是佔優勢的。等到後來秦人強大起來，統一中夏以後，秦語

13. 見劉端臨先生遺書卷一，論語駢枝，葉9a-b (儀徵阮氏刊本)。

## 自序

和晉語又相互交融，到了西漢建都長安的時候，所承接下來的官話應當就是秦晉之間的語言了。

(4) 方言裏所記的特殊方語是循地理的分布而表示差別的，有的通行的區域狹，有的通行的區域廣。在語言上有的是聲音相近的‘轉語’，有的是聲音不同的‘同義詞’。從聲音不同的同義詞可以看出不同的人造詞的心理過程，從聲音相近的轉語可以看出聲音在方言中轉變的條理。

(5) 方言距今已經一千九百多年了，其中所舉的方語在現代方言裏依然保留着很多。這種語彙大半都是口頭語，而且是文人不大寫在文章上的。例如：‘慧謂之鬼’，‘憂謂之怒’，‘斂物而細謂之擎’，‘入肥盛曰腰’，‘器破曰披’，‘器破而未離謂之璺’，‘貪飲食者謂之茹’，‘庸謂之僂’，‘子曰嵒’，‘物生而不長大曰燶’，‘凡相推搏或曰撏’，‘小籠謂之簀’，‘飯筯謂之筍’等，都是大眾口裏流行的語。如果沒有方言記載下來，我們就無從知道這些語言已經遠在漢代就有了。還有方言書裏的古語有些在現代方言裡仍舊保存着，可是語音和現代方言中文字的讀音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知謂之黨’就是現在北方說的‘懂’；‘物大謂之奘’，現在北方說‘*zhuang*’；‘耦曰嫵’，匹萬反，現在北方稱‘雙生’也叫‘雙 *banr*’；‘兩曰路’，音略，現在北方說‘瞓’ *lou*；‘鷄伏卵而未孚，始化曰譁’，現在普通說‘寡’ *gua*’；‘鍾，重也’，現在說‘秤鍾’叫‘秤 *te*’；‘結，持也’，現在普通說布上的絲結叫‘結絲’，音 *xua*’；‘久熟曰曾’，現在普通說‘*kiu*’。諸如此類，也都是‘古語之遺’。

(6) 前人說方言多奇字，是就文字的寫法來講的，如果從語言的觀點來看，這些字只是語音的代表，其中儘管和古書上應用的文字不同，實際上仍是一個語言。例如：‘𠙴’同

## 自序

‘喧’，‘唏’同‘歎’，‘愁’同‘惄’，‘奔’同‘介’，‘脅閱’同‘脅嚇’，‘踏’同‘踢’，‘恪’同‘格’，‘鴻’同‘鴟’，‘蓋’同‘爐’，‘益’同‘捲’，‘賀’同‘荷’，都是很明顯的例子。更有很多古今相同的語言，方言寫的字和現在一般所寫的不同。例如‘少兒泣而不止謂之咷’，現在寫‘嗰’；‘好曰針’，現在寫‘俏’；‘遽曰茫’，現在寫‘忙’；‘猶曰姤’，現在寫‘猶’；‘縫納弊故謂之綈’，現在寫‘紓’；‘釁謂之弑’，現在寫‘弑’；‘雷謂之梟’，現在寫‘鉞’；‘僉謂之棓’，現在寫‘棒’；‘火乾曰炙’，現在寫‘炒’；‘裁木曰鋸’，現在寫‘劈’；這些都是音義一樣的。所以我們不能墨守文字，而忽略了語言。

從這幾點來看，方言在漢語語言史上的價值既然很高，同時也就關涉到整個的中國文化史。尤其重要的是它啓示了我們怎樣去明瞭語言，如方言和普通語的關係，古語和現代大眾語的關係等，都是值得重視的。

今本方言是晉郭璞的注本，凡十三卷。隋書經籍志<sup>14</sup>和新唐書藝文志<sup>15</sup>著錄的也是一樣。但是劉歆和楊雄往來的信裡說是十五卷，郭璞的方言注序裏也說是‘三五之篇’，卷數和今本不同。這應當是六朝時期的變動。至於字數，在應劭的風俗通義序裏說是九千字，但據戴震的統計<sup>16</sup>，現在郭注本有一萬一千九百多字，比應劭所見的本子多出將近三千字。這些字是在什麼時候增添出來的，已經無從考訂。我想一定是郭璞以前的事情。因為大凡一種古書有了好的注本以後，就不易有什麼改動了。以郭注方言而論，我們

14. 見隋書卷三十二，志二十七，葉27b-28a。

15. 見新唐書卷五十七，志四十七，葉9b。

16. 見戴震方言疏證序。

## 自序

可能考查出來的佚文，為數很少，就是很好的證明。

郭璞(A.D. 275-323)<sup>17</sup>是精通音義訓詁的人，他的方言注和爾雅注解說字義都有一貫的精神，那就是用今語來說明古語。爾雅注裏固然常常引用楊雄方言和晉代的方言來解釋古語，在方言注裏更常常舉出晉代的方言來和楊雄所記的漢代方言相比較。在意義上，或者證明古今語義相近，或者說明語同而義不同和義同而語不同。在地域上，或者指明某些古語依然在某地保存，或者指出某些古語不在當地保存，而轉在別處却有這樣的說法；甚至於更進一步的變成了一般的普通話。這就是他在序文裏所說‘觸事廣之，演其未及’的意思。王國維書郭注方言後三<sup>18</sup>已經把這種精神指出來了。但是在郭璞解釋方言語詞的時候，還有一些條例，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1) 原來‘釋詞’不明晰的，給一個明確的解釋。例如：‘虔、儂，慧也’，注：‘謂慧了’。‘烈、棆，餘也’，注：‘謂殘餘也’。‘子、蓋，餘也’，注：‘謂遺餘也’。‘斟、協，渢也’，注：‘謂和協也’。‘譖，怒也’，注：‘謂相責怒也’。‘爰、喚，恚也’，注：‘謂悲恚也’。凡注中說‘謂某某’的大都屬於這一類。說‘謂某某’，猶如說：‘這是指什麼意思來說的’。這是一種限制的說明。

(2) 說明方言中一個語詞所以這樣說的意義。例如：‘慧，秦謂之謾’，注：‘言謾詫也’。‘好，秦曰娥’，注：‘言娥娥也’。‘眉，老也，東齊曰眉’，注：‘言秀眉也’。‘嬪，美也，南楚之外曰嬪’，注：‘言矮嬪也’。‘楚東海之間卒謂

17. 見晉書卷七十二，列傳四十二，葉1a-7b。

18. 見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集林卷五，藝林五，葉10b-14a  
(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 自序

之弩父，或謂之褚’，注：‘言衣褚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聾’，注：‘言無所聞常聾耳也’。凡注中說‘言某某’的大都屬於這一類。說‘言某某’，猶如說：‘意思是說什麼，所以有這樣的說法’。

(3) 用普通語詞來解釋特殊語詞或特殊的文字。例如：‘台，養也，’注：‘台猶願也’。‘鬱悠，思也，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注：‘鬱悠猶鬱陶也’。‘瀧涿謂之霑漬’，注：‘瀧涿猶瀨滯也’。‘惛，江湘之間謂之頓惑’，注：‘頓惑猶頓悶也’。‘南楚愁恚憤憤毒而不發謂之氐惆’，注：‘氐惆猶懊惱也’。‘廉，老也’，注：‘廉猶眉也’。凡注中說‘猶某某’的大都屬於這一類。

(4) 用語言裏的複音詞來解釋原書的單音詞。例如：‘渾，盛也’，注：‘們渾肥滿也’，‘懼，愧也，梁宋曰懼’，注：‘敕懼亦慙貌也’。‘徒，行也’，注：‘徒循行貌’。‘踴，力也，東齊曰踴’，注：‘律踴多力貌’。‘杜、蹠，蹠也，趙曰杜，山之東西或曰蹠’，注：‘卻蹠燥蹠貌’。

(5) 說明‘語轉’。例如：‘薦、譎、譁，化也’，注：‘皆化聲之轉也’。‘蘇，草也’，注：‘蘇猶蘆，語轉也’。‘否，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虧’，注：‘湯料反。此亦聲轉也’。‘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挈，或謂之渠疏’，注：‘語轉也’。這些都是說明因聲音的改變而生的‘轉語’。還有說明語音不正而生的轉語的。例如：‘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蕡，或謂之麌’，注：‘此直語楚聲轉也’。‘吳越飾貌爲鉤，或謂之巧’，注：‘語楚聲轉耳’。說‘楚’，猶如說‘偷’。

從以上五點我們可以看出郭璞注這一部書照顧的方面非常之廣。方言是一部好書，幸而又有郭璞的精善注本，真